

从明代人口流动看城池修筑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董春林¹ 赵双叶²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2.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明代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为了与民休息、稳定政局、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修筑城池便成为政府政务中的大事。虽然,最初修建城池只是为了应对一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明代;人口流动;城池修筑;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09)01-0086-04

明代流民问题历来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此前针对明代流民的研究已硕果累累,然而,多数学者都是围绕流民特点、成因、影响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而政府应对流民问题时,因为兴修城池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却少有论及。笔者以为,明代政府为应对流民而修建的城池,是与流民运动互动发展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及社会经济的繁荣。本文在对明代人口流动类型、城池的修筑与人口流动的关系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修筑城池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一、明代人口流动类型

归纳起来,明代的人口流动类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组织的迁移;二是局部人口相对过剩造成的迁移;三是因自然灾害的迁移。

(一)政府组织的迁移

这里指政府为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而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在军事上,这种移民方式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到了明代,由于塞外的北元势力依然很强大,边境地区极不稳定,为了加强边防安全,不仅每年都有一次例行性出边界烧荒行动,而且还迁移了大量内地人口实边。洪武四年三月(公元1371年),潘敬等迁徙顺宁、宜兴州沿边“密迩虏境”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户17 274,口93 878,仍让其旧部将校管理^[1]。另外还出现了像洪洞大槐树这种为了调节地区间人地不均的移民活动,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公元1389年),朱元璋下令,杭州、湖州、温州、台州、苏州、松

江府无田百姓,每户给钞32锭使备农具,免除赋役三年,到淮河正南的滁州、和州地方就耕^[2]。这些都是政府出于稳定社会秩序,从宏观上作出的人口调节政策,有效地处理了人口空间分布失调的问题。

(二)局部人口相对过剩造成的迁移

这里指由于上层社会对土地掠夺等原因,造成人口失地,局部地区不能容纳这些人口,以致逃亡而出现的人口流动。上层阶层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牺牲穷困百姓的利益,依然以奏讨形式来掠夺土地,扩大田庄。外戚——正是利用其身份的优势来不断搞特殊化的一个特殊阶层。成化四年四月(公元1468年),宪宗母周太后的弟弟周寿占有顺天府涿州田63顷^[3]。类似之事时有发生,太监看到其中的利益巨大,也利用了自身与皇帝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来取得利益。隆庆元年六月(公元1567年),穆宗就恩准了太监梁钿等奏请“以隆庆、怀来等州卫所庄田归有司,以供军饷”^[4]的请求。理由冠冕堂皇,实则为了私利,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这些庄田据为己有。这种掠夺如蚕食桑叶,在不知不觉之中,上层阶级腰包日益丰厚,而百姓囊中却日渐羞涩,生活更加捉襟见肘,人们只能背井离乡,拖儿带女,寻找另一片生存空间。

(三)因自然灾害的迁移

自然灾害指自然变异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损害,一般包括水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形成的过程有长有短,有缓有急。在抵抗能力极低的传统社会,当这种灾难发生在小范围内,百姓会通过一系列自救措施,很快就渡

收稿日期:2008-10-14

作者简介:董春林(1978-),男,河南平顶山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过难关,反之,则不然。如正统十年三月(公元1445年),“陕西远近饥民求食者日有二千余人,饿死数多,高陵、渭南、富平等县居民俱闭门塞户,逃窜趋食”^[5]。对于这种大面积的灾害,如果不逃,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一旦灾难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大,单靠自身力量无法渡过,加之国家实施的救荒政策不及时且有失误时,百姓纷纷出逃是再平常不过了。明景泰五年十一月(公元1454年),前任河南参政孙原贞奏称:“河南之开封、汝宁,山东之兖州,直隶之凤阳、大名,此几府地境相连,往时近黄河湖泊蒲苇之乡,浚河泄水消遂为膏腴之地,逋逃潜住其间尤众。近因河溢横流,此几处水荒,流民复散,间有回乡,多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逐食,恐其相聚为盗。”^[6]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既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也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因此,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了像修筑城池这样的措施,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步前进。

二、城池的修筑与人口流动的关系

古代的城市是为方便人们交换聚居而发展起来的。因安全或军事需要,又修筑了城池。“我国历史上各地城池用土做城墙,即谓土筑城,个别的城池,用砖包皮成为砖城。但到明代,国力强盛,经济以及手工业发展,大量生产青砖,因此建设砖城,也就是说把土城墙都进行内外包砖,出现大量砖城,看起来非常美观,而且又坚固”^[7]。可以这样说,明代统治者大规模修筑城池与当时人口频繁流动有关,下面仅以明代南阳府筑城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见表1)。

表1 明代南阳府及各州、县的城池修筑次数

府州县名	修建时间
南阳府城	洪武三年建。
南召县城	成化中建。
唐县城	洪武三年建;正德十二年重建;嘉靖中增筑。
泌阳县城	成化五年建;正德六年、崇祯十四年增建。
桐柏县城	成化十三年建;嘉靖中重建。
镇平县城	正德九年建。
邓州城	洪武二年建;弘治十二年筑外城;正德六年增修;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五年,复营葺外城;万历中,增浚外城河;崇祯七年、十年重修。
淅川县城	成化七年始筑;正德六年,流贼起,修;正德十五年,屡加增筑;万历五年,浚濠加深。
新野县城	天顺五年建;成化十二年修筑;正德六年增高;嘉靖四年浚濠。
内乡县城	洪武二年筑;景泰三年修;天顺五年增筑;成化间继续修;正德六年,流贼起,整修;正德十一年,重修;嘉靖六年,重修;万历二十七年增筑。
裕州城	洪武三年建;正德六年修。
舞阳县城	成化十九年建;正德、隆庆中重建。
叶县城	正德六年增筑;嘉靖三年浚濠;隆庆、万历中重建。

资料来源:《嘉庆重修一统志》一三;《河南南阳府·城池》和嘉靖《邓州

志》卷九:《创设志·城池》。

从表1可知,明代南阳的各府、州、县共修筑城池44次,仅明中期即宣德到嘉靖年间,就修筑了30次,占总次数的68%,其频繁程度非同一般时期。而这时的明王朝正处于中衰时期,政局不稳,官府主政无力,导致荆襄地区的流民潮一浪高过一浪,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荆襄流民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等反”^[8]。大量不堪生活重负的百姓,在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重压迫下,站到与官府对抗的对立面,成为官府眼中的流民、流贼、流寇,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面对这种社会弊病,国家为了自身政权和百姓生活的考虑,对于加强社会治安之事十分重视,修筑城池就是其中的办法之一。正德九年九月(公元1514年),“命广宁伯刘侏督军修理城池”^[9],不但平时认真对待此事,出了问题之后仍严格要求下属,时刻警惕二次危险。正德六年四月(公元1511年),因为江西新淦、万安、新喻县治被贼攻破,急“令巡按御史查勘失事官,停其俸,严限督捕,仍令总制官时葺城池”^[10]。另外,对于下属严加管束,决不能让社会出现人心浮动、扰乱治安之事。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公元1542年),灵丘王聪涌以“绛州城池卑浅,虏报时警,乞徙避平阳府”,皇帝严词拒绝了其请求,下诏曰:“王不得擅离本土,摇惑人心,城池命有司勘议展。”^[11]对于合理请求,皇帝会酌情考虑,酌情处理。河南归德州处于黄河中下游,时常遭受黄河侵袭。弘治十六年九月(公元1503年),在得到“河南守臣以归德州城池没于大水,不堪居守,请筑新城于州治之北”^[12]的请求之后,经考查情况属实,孝宗遂准其奏请。还有,景泰元年十一月(公元1450年),在接到广东雷州府因“遂溪县逼近猺贼,数被侵扰,原无城池,恐难保守,乞敕布政司量发附近府县人夫筑浚”^[13]的奏报后,代宗立即准奏。

中央政府还把城池修筑作为判断地方官员升迁的依据之一,所以,各级官员在任之时,皆把大修城池作为己任,地方官员的做法也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因此,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因流民刘千斤等作乱,都御史原杰……以旧基恢拓之(即郟阳府),甃以砖”^[14]。当危机突发之时,临时抱佛脚,显然不是上策。因此,为了预防危机的不期而至,各地官员在闲暇之时,也会修缮城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公安县)知县周臣重甃以砖石”^[15]。有的地方在修缮破损城墙时不只是一般性用砖石包裹,还会增建防御性工事,以增强其防御功能,郟

西县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都御史王浚,“重修(城池),建楼,凿池环之,深一丈,广倍焉”^[16]。而有的城池规模较大,它的建造实为一项浩大工程,往往要动员官、民、军等社会力量全力合作才能完成,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邓州外城就是“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知州吴大有筑”,当时动用了“军三,民七分”^[17]的力量才完成这一工程。城内百姓也认识到城池的重要性,对于修筑城池之事,不但出力,还倾囊相助。“隆庆二年十月(公元1568年),山西督抚官陈其学、杨巍等奏报:三晋士民各捐财力修筑城池、堡、寨六百余座,省公费,不费”^[18]。政府官员边修筑城池,边实施其他安抚办法,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元末兵燹,民皆鼠徙”,洪武初,鄆城县丞齐原芳“缮城邑,修室庐,督农事,商贾、流民闻风而归者九百余户”^[19]。

中央政府对于没有守好城池失职之官员亦严惩不贷。“成化元年六月(公元1465年),都察院奏:湖广桂阳所千户樊瑄坐失陷城池,罪状诉分兵守城门,被贼与居民避难者混入,以致城陷,父母亲属俱被害。茶陵卫指挥佾事刘政系邻境,不即救援。瑄罪律当处死,政罪当充边卫军”。对于樊瑄“失陷城池”,刘政“不即救援”,最后致使城破,民被害,这种事是有违中央法令的,但面对其本身也是受害者的实情,皇帝在三思之后,基于“瑄罪虽应死,但父母俱被害”的事实,认为“其情可矜”,最后,“并政充军之罪,俱宥之,各降三级”^[20]。另外,在成化三年八月(公元1467年),因为同样的原因孙震也因罪被降为广西都指挥同知,“初震充参将,分守浔梧等府,不设备,为流贼攻陷城池,杀虏男妇,坐失机,当斩”,皇帝经过再三考虑,“宥其死,降三级,令就彼,听调杀贼”^[21],孙震这才捡回一条性命。所以,中央政府一再重申,严明法令,“军卫有司失陷城池者,宜明着其罪并拟功罪以闻”^[22]。

总之,人口流动与城池的修筑密切相关。只有人口流动了,人们才会修筑城池,反之,修筑好了城池,人口才会向那里流动。城池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三、修筑城池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在传统社会,城市防御所倚靠的重要设施就是城池。到明代嘉靖年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修筑了大量高质量的砖城墙。透过人口流动引起的社会动荡,我们可以看到修筑这些砖城墙的深意。

其一,保护了百姓的生命安全,使得社会经济

生活正常运行。据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记载,明代共发生了1 022次灾荒,在明代276年的统治时间里,平均每年就要发生3.7次灾荒,与此同时,吏治腐败,束缚百姓的赋役黄册和户口的鱼鳞图册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致使大量人口逃亡,流贼横行,导致社会治安极不稳定。崇祯五年六月(公元1633年),“汝州大水湮没村落,颓坏城垣十之五,鲁山县大霖雨,城垣尽圯”,当城池受到自然的破坏时,“东乡土贼张三、杜小川等乘机作乱”。只有坚固的城池加之强大的军事力量,才会起到防寇的作用,如“崇祯八年(公元1636年),贼攻鲁山城五昼夜,防守甚密,又兵自北至,寇乃遁”^[23]³¹。所建城池成为周围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心,从而使得治所的各种功能得以正常运转。有了城池这一安定的环境,百姓就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定居下来,使生产交换得以正常进行,在繁荣城市经济的同时,社会财富也迅速积累。反之,就会出现“正德六年(公元1512年),蓟贼刘六、刘七反攻宝丰县,县土城不能御,遂入抢掠”^[23]³¹这种事件。所以,城池一旦被攻破,就会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经济生活秩序被打乱,连居民生命也难保全。因此,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开国初期就发出号令:“诏天下都司、卫所修治城池。”^[24]

其二,城池的修筑次数、规模、质量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修筑城池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会筑有什么样的城池,城池的规模、质量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明代修筑城池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质量之高,达到中国历代筑城规模的顶峰。城池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又为修筑城池创造了条件,城池规模越来越大,各种设施也更加完备。透过城墙的质量,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这在当时大量的文献资料中能窥见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例如,嘉靖万历时期,工商业城市勃然兴盛,苏州就是一个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之一,“每漏下十余刻,犹有市”^[25]。又据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中记载:“擅丘市: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圻乐艺诸工俱备……吴江县市: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2 000余家,方巷开络,栋宇鳞次,百货聚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业者,往来无虚日。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26]像这样经济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

其三,城池的修建不仅稳定了流民带来的动荡社会秩序,而且推动了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及旧有城市的繁荣。修建的城池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长垣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开国之初至正德六年(公元1512年),长垣县已六次修葺城池,因此,经济繁荣,“正德六年(公元1512年),会畿内盗起,劫掠城邑,闻长垣素称富庶,并来夹攻,几为所屠也”^[27],坚固的城池还是换来了城内持续的繁荣兴旺。明成化年间,由于流民大规模拥入河南的南阳盆地,尤其是盆地边缘的伏牛山区和桐柏山区等,人口剧增,统治者为加强管理,在原有基础上,复置或增置了南召、浙川、桐柏三县,其中的南召县才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始筑城”^[28]。人口的流入也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前进,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因“陕西至荆、襄、川、陕、唐、邓之间,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有司捕遂不熄,都御史李贤上其事,上命(都御史)原杰从莅之,杰奏开设八郡州县,以安流民,而于郟县置郟阳府”,郟阳府的设立,不仅加强了该地区的管理,也对其城市规模 and 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居住在城市的人们“以商贾为业”,“不以储蓄为意”,“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29],过着无忧无虑的逍遥生活。

总而言之,明朝统治者把城池修筑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来对待,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作用,同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城池对推动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明代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和城市的经济繁荣。

参 考 文 献

- [1]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 199.
- [2]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六[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 941.
- [3] 明宪宗实录:卷五十三[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 065.
- [4] 明穆宗实录:卷九[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42.
- [5] 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 545-2 547.
- [6]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七[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 356.
- [7]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
- [8] 郟阳府志:卷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94.
- [9]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 351.
- [10] 明武宗实录:卷七十四[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 630.
- [11] 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八[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 175.
- [12] 明孝宗实录:卷二百〇三[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 778.
- [13]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 212.
- [14] 郟阳府志:卷五[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136.
- [15] 荆州府志:卷八[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08.
- [16] 郟西县志:卷二[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55.
- [17]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邓州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22.
- [18] 明穆宗实录:卷二十五[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682.
- [19] 河南通志:卷二二[M].书影本.日本京都大学,2000:41.
- [20] 明宪宗实录:卷十八[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75.
- [21] 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五[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930.
- [22] 明武宗实录:卷七十三[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 613.
- [23]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百册[M].上海:中华书局,1934:31.
- [24] 张廷玉.明史: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9.
- [25] 李铭皖.苏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38.
- [26] 吴江县志:卷四[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25.
- [27]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长垣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5.
- [28] 孔传金.南阳府志:卷四[M].清嘉庆十二年刻本,1807:48.
- [29]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7:69.

(下转第100页)

第三,升华校园文化,将创新文化和创业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主旋律。校园文化建设应当弘扬创新文化和创业文化,并且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结合,使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深厚而持久的动力。

第四,改革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模式,创造宽松的行为环境。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倡导“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伦理、创新人格、创新情感和创新意志等非智力因素。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R]. 2006-02-09.

[2] 邹海贵,黄华勇. 论德育对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的功能[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2(6):176-177.

[3] 徐栋梁. 了解校史 秉承校训[N]. 武汉科技大学报, 2002-06-14(2).

[4] 何明昌. 武汉科技大学校史沿革[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8:108.

[5] 王伟廉. 我们应当关注什么——关于知识与大学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2000(2): 21-24.

[6] 钱学森. 论系统工程:增订本[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80.

[7] 邹海贵. 知识经济下我国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 2003:18-19.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sci-tech activities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ang Z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Law and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China)

Abstract: Extracurricular sci-tech activities can raise student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develop their innovative a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explorative learning.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sci-tech activitie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aving been made from a variety of practices. However, the flourishing practice call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ory. This article, with the use of the methods of system theory and aided by the theories of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xtracurricular sci-tech activities, with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en as an example. It points to the problems in extracurricular sci-tech activi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sci-tech activiti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sci-tech activities; system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彭国庆]

(上接第 89 页)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it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economy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in Ming Dynasty

Dong Chunlin¹ Zhao Shuangye²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Frequent population mobility in Ming Dynasty impacts on social security. For political security, social harmony and a relatively s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turns to city construction and takes it as an important agenda. Though initially an approach to dealing with social turbulence in a certain period, city construction has, to some extent,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population mobility; city construction; social economy

[责任编辑 彭国庆]